

杨万里佚文《罗塘许氏族谱序》辨伪

纪永贵

《文献》2006年第2期发表胡建升先生《杨万里佚文考》(以下省称“胡文”),首次披露作者所发现的《罗塘许氏族谱》中一篇署名杨万里的序文《罗塘许氏族谱序》。胡文从“杨万里作序的时间和地点”、“杨万里与许叔达交往考”、“佚文文本内容与杨万里思想关系考”三个角度印证、推断此文为杨万里的一篇久佚之作,并认为“佚文的发现,对研究杨万里在奉新县任县令时清廉政绩、不扰民,对了解杨万里的思想体系、儒学精神和治易门径都很有价值。”

但是细读胡建升先生提供的序文文字,笔者认为,这是一篇冒署杨万里之名的伪作,序文思想浅显,内容空洞,文笔乏采,其中矛盾之处不在少数,根本不是什么“很有价值”的发现。现试从三个角度一辨其伪,并提出一点浅见,以求教于方家。

证伪之一:序文的署款

胡文提供的《罗塘许氏族谱序》的署款为:

大宋乾道六年岁次庚寅秋月□□穀旦

赐进士第宣德郎中大夫焕章阁待制宝谟阁学士

太子少保吉水杨万里诚斋甫顿首拜撰^①

胡文已经注意到,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杨万里撰写此文时,署款中杨万里的一连串官职还没有发生:“杨万里淳熙十二年乙巳(1185)升为吏部郎中兼东宫侍读,庆元四年己未(1199)加封为宝文阁待制,嘉泰三年癸亥(1203)诏进宝谟阁直学士,开禧二年丙寅(1206)升为宝谟阁学士。”这说明杨万里在写这篇族谱序文之时,就已将自己后来若干年(最长达36年)才获得的各种官衔全都署上,这是极不可信的事实。为了解释这一不合理的现象,胡文接下来认为:“加在杨万里前的这些头衔是后人在修谱时对先贤的崇敬而添加上去的。”胡文的这种推断有先入为主的嫌疑——先认可此文为杨万里之

^①《文献》2006年第2期,第101-102页。

作,然后对署款中时序颠倒的矛盾曲为之解。其实,“顿首拜撰”之语明明是杨万里的口吻,“后人”再作这样不合理的添加,只能是授人以柄,说明此序已非原物。另外,“后人”为了确认这个“杨万里”就是南宋那个大诗人杨诚斋,于是在姓名后再添上“诚斋”二字,这种做法实在是画蛇添足。

《文献》1990年第3期曾发表萧东海先生的文章《新发现杨万里佚文〈五一堂记〉述考》,该文所附的《五一堂记》是一篇精美的散文,其为杨万里的佚文之说是比较可靠的。其落款为“淳熙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诚斋野客杨万里”,这符合杨万里署款的惯例。据查《诚斋集》,可以发现,在“序”、“记”、“跋”等文章后面的落款,因在本集中,大多只记时间而没有署名,如卷八十《黄御史集序》:“淳熙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若日期后加上署名,其基本格式则是:“皇帝年号+年数+诚斋野客+杨万里(或杨某)”或直称“诚斋野客”或“杨万里”,略如:

卷七十四《郴州仙居转般仓记》:“绍熙初元九月既望具位杨某记”。

卷七十五《不欺堂记》:“诚斋野客记”。

卷七十七《山居记》:“开禧乙丑六月既望诚斋野客庐陵杨万里记”。

卷七十九《李去非愚言序》:“年月日杨万里序”。

卷八十《似剡老人正论序》:“淳熙甲辰十月三日诚斋野客杨万里序”。

卷八十二《诚斋江西道院集序》:“淳熙己酉十月三日诚斋野客庐陵杨万里”。

卷一百一《跋李氏所藏黄太史张右史帖》:“年月日诚斋野客庐陵杨万里廷秀敬书”。

这些署款中,“诚斋野客”只在“杨万里”之前出现,有少量是将字“廷秀”放在姓名后的,却没有将别号署在姓名之后的例子,而序文在“乾道六年”之前加上“大宋”二字在杨万里的笔下也是没有先例的,更没有一例把具体官衔加在自己的姓名之前。所以《罗塘许氏族谱序》的署款非出杨氏之手应是无疑的。

证伪之二:序文作者称呼许叔达为“年翁”

《罗塘许氏族谱序》一文中,有一个词“年翁”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伪证。这个词在这篇短文中一共出现五次,均是作者对修谱者许叔达的敬称,所以不可能是“后人添加上去的”。这五处文字是:“审是庶可知许年翁修明之旨矣”、“年翁讳叔达,字商叟”、“因家于年翁之罗塘”、“今年翁留心谱牒,奋然增修”、“《诗》曰:貽厥孙谋,以燕翼子。年翁以之。”胡文认为:“在此序言中,杨万里称呼许叔达为‘年翁’,一方面可以证明杨万里与许是同榜登科,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杨万里对许是很尊敬的。”因此,胡建升先生也认定这个词“年翁”非为“后人添加的”,而是原文所有。其实,杨万里对同榜登科的进士从来

不称“年翁”，而只称“同年”，更重要的是，“年翁”这个词是明代才出现的一个敬称，杨万里不可能用到。

现将《诚斋集》中称同榜进士为“同年”的诗文摘录一二：

卷六《寄马会叔》：“影转郎官宿，春随刺史天。相从忽相别，同舍况同年。”

卷六十六《答葛寺丞书》：“有如年丈，以四海九州同年之契，三年江上从游之乐……，云我葛同年之寄远也，端拜函书，披读笺辞。”

卷八十《达斋先生文集序》：“某生于南溪，长于南山，既冠而学于安福。绍兴庚午与叔父达斋先生同举于礼部，皆闻罢，甲戌再同举于礼部，遂同年策第。某于是始一至南溪，谒族亲邻曲。”^①

这些材料可以说明，杨万里称自己的同榜登科者为“同年”，卷六十六有“年丈”一称，但却无“年翁”一词的踪影。卷八十所谓“达斋先生”杨辅世，于绍兴甲戌与杨万里“同年策第”，那杨万里真应该称他为“年翁”了，可是杨万里却不知道这样称呼他。以上材料中，杨万里提到的“同年”有多人，但他一直使用的敬称均为“同年”。

《江西通志》卷五十“选举二”所载“绍兴二十四年甲戌张孝祥榜”，仅江西籍的进士就有50人之多。“奉新人知宜春县”的许叔达与杨万里同榜登科，而杨万里又做过奉新县令，二人相识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人与杨万里也是“同年且同舍又同志”的至友。正是在奉新任上的政绩，杨万里才被举荐于朝，可知杨在当地一定有很大的影响。请这样一个“同年”来为自己的家谱写一篇序言，也是可能的。但是，不管这个许叔达有多大年纪，杨万里都不可能称他为“年翁”的，这倒不是杨万里对许不很尊敬，而是因为在杨万里的时代，作为专称的“年翁”一词尚未出现，更不是“同年”的别称。那么，这个词出现于何时呢？

“年翁”二字最早只是组合词即“百年翁”中的一部分而不能独立使用，表示年长寿永者，是快乐人生的象征，有时也可以指代高寿的父亲，这个词宋代开始才常用起来。北宋刘敞《公是集》卷十九《寿山》：“上多千岁木，下有百年翁。”北宋刘攽《彭城集》卷十《莫昭禅师》：“诸天方丈室，万事百年翁。”北宋韩维《南阳集》卷十一《送太素南游》：“戕性伤生俗所同，人间今见百年翁。”南宋汪藻《浮溪集》卷三十《致政鲁奉议挽诗二首》之二：“早沾三釜禄，几作百年翁。”南宋张炎《山中白云词》卷一《木兰花慢》：“从容。吟啸百年翁，行乐少扶筇。”

以“年翁”一词尊称某人的习俗起源于明代，明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一有诗题《和张华东年翁斋居祈雨韵》和《途次和张年翁咏桃花》，该书称某

^①本文所引杨万里《诚斋集》及相关古籍原文均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人为“老年翁”的例子还有很多处。这里的“年翁”可能是“同年”的代称了，而更明确的例证则如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四百六《送同年翁进士晏归省》：“万里青霄路始通，白云情思倍匆匆。……慈恩未报天恩重，寸念难忘是孝忠。”

入清之后，“年翁”、“老年翁”之称已广为使用，在文人的笔下多与“同年”之意有关。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十《与杨犹龙太史》：“今日吴梅村札来，云温邢任沉南北联镳，正指年翁而言。”不仅是这位大学士魏裔介的文字中“年翁”一词使用十分频繁，而且他同代文人的“辞典”中也都有了这个词汇，如孔尚任《桃花扇》第二十一出：“相府连日宴客，都是那几位年翁？”但在民间口语中，这个词只是对年高望重者的尊称，未必与科举功名有关。清人沈自南《艺林汇考·称号篇》卷四“尊长类”：“……《留青日札》：今人年老行动不便，曰龙钟。自来多不解其意，余以为，钟，聚也，故《说文》曰：如天之钟，美是也。盖言龙至于老则蟠聚，而不能奋飞，故以之称老年翁也。”此处“老年翁”便仅指老年人而已，并没有特别的意义。

胡文之所以认为“杨万里称呼许叔达为‘年翁’，一方面可以证明杨万里与许是同榜登科，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杨万里对许是很尊敬的”，这恐怕是出于望文生义的推测。唐诗中有多例“十年兄”之称谓，其中“年兄”二字未必能独立成词，如郎士元（一作李端）《闻蝉寄友人》：“因垂数行泪，寄书十年兄。”白居易《寄陈式五兄》：“惆怅料君应满鬓，当初是我十年兄。”不过宋代将“同年”尊称为“年兄”的例子已经很多了。如欧阳修《和应之同年兄秋日雨中登广爱寺阁寄梅圣俞》、苏轼《送晁美叔发运右司年兄赴阙》、苏辙《送余京同年兄通判岚州》、黄庭坚《还深父同年兄诗卷》、秦观《即席次君礼年兄韵》、晁补之《即事呈閤中顺之二年兄二首》、晁说之《忆江南赠通叟年兄》、张耒《中秋无月戏呈希古年兄》等。南宋马永卿《懒真子》五：“绍兴六年夏，仆与年兄何元章会于钱塘上。”南宋周必大《淳熙玉堂杂记》卷中有自注：“初谓年兄入相锁院”。看来，这里的“年兄”是“同年兄”的省称。如此类推，对年长的“同年”难道不能称为“年翁”吗？然而，这种望文生义的逻辑是与历史事实相悖的。

笔者还查询了与杨万里（1127年生）年岁相仿佛的“南宋四大家”陆游（1125年生）、范成大（1126年生）、尤袤（1127年生）三人的诗文集。杨万里与他们都有交往，在他们的笔下，均未见过称什么人叫“年翁”的，而“同年”却是一个常用词。因此，杨万里的时代，可以称同榜进士为“同年”、“年兄”、“年丈”，但却不可以称“年翁”。

证伪之三：序文思想浅显、内容空洞、语言乏采

胡文说：“首先，文本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与杨万里的哲学思想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另外，文本所体现的伦理思想也是与杨万里重视人伦关系的思想相符合的”。然而，认真读一读这则短文，我们就难以相信这样的结论。

“杨万里是一位理学大师”，可序言一点也不符合这样的身份。序言讲了四层意思，胡文将之分成两段是不太合理的。第一层是从理学角度来论说天人相副的道理，简言之，就是天地有道，人事亦然，“至于族之蕃衍，有图统之，图之简质，以谱著之，斯精哉，苗裔之用心也”，“何以言之，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而为六十四卦，是非乾坤统于六子之变化无穷乎”。这哪里是“尽平生之力”研究理学的大师思想，实在是一个乡村秀才就能明白的常识。胡文在引了《诚斋易传·系辞》中的一段话后得出结论：“试比较序言文本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与杨万里对《易系辞》的阐发，结论如出一辙。”但笔者对读了两家之文后，认为《易系辞》的文字不仅见解独到，而且文辞优美，推理绵密。而序文的第一段内容空洞，思路偏狭，文字干枯，语法单调。

序文所讲的第二层意思是关于家谱存在之理，目的是点明“此理本自相通而无容岐视，审是庶可知许年翁修明之旨矣”。一望即知，这一段是在吹捧许叔达通明事理、智慧超人。这种吹捧实在有失风范。修家谱乃是起源悠远之事，在当时也不过是文人雅士、官僚乡绅中流传的一种时尚，杨万里不必将许叔达修谱之举推颂为“修明之旨”。

第三层和第四层是回顾许氏的渊源并指出许叔达增修家谱的意义，均不过是些老生常谈之语：“世世相承、簪纓弗替”、“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继往开来，俾世德昭，垂于不朽”、“许氏子孙其懋之哉”。如此套话谀辞，哪里有什么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这是卖文为生的村学究下笔即有的现货，与饱学之士、清廉之士、文学之士杨万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诚斋集》卷七十八至卷八十四共七卷全是“序”文，我们只要从头浏览一过，就会发现，从内容上看，杨万里序文均充满感情，以人为本，既展现了所写之人鲜活的风采，更表达了作者滚烫的心声。杨万里写“序”的基本格式，总是开门见山，知人论世，来龙去脉，井然有序。如果按这样的写法，《罗塘许氏族谱序》着意要写的应该是修谱者许叔达的为人、为官、为友的品质和修谱的缘起、过程等情况以及杨万里与许叔达的交谊。可是《罗塘许氏族谱序》对修谱者的家庭状况、道德文章、个性爱好一无所说，根本就没有宜春县令许叔达的任何实在内容，对修谱的前因后果也没有介绍，更没有杨万里身为奉新县令的丝毫影像。这样的谱序可以送给任何一家修谱者，只需将其中许氏的渊源改成某氏的渊源，再将面目模糊的修谱者改换另一个姓名即可。

从语言文采上看，因杨万里写诗是讲究“活法”的，其文也显得清新活脱。只要读一读《诚斋集》中的文章，杨万里清俊的个性、斐然的文采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那篇佚文《五一堂记》也不例外，在此略引一段，便可让这篇谱序相形失色：

岳英之居，梁柱榱桷皆宝元、庆历以前物也，而左右前后环以数百年之老木寿藤。其上有鹤，夜寒露下，则嘎然而唳，声闻数里，又不知何代物也。岳英葛巾藜杖，相羊其间，年七十四而见如五十许人。鬓须黝然，无一

茎白,其将于老木寿藤相永乎?亦又驭风骑鹤,餐朝露,酌天浆,以往乎山间也。余愿从之游也。^①

寥寥数语,不仅写出了五一堂的沧桑风貌、堂主萧岳英的神采,更重要的是表明了作者自己的志趣。语言生动,文法天然。与《罗塘许氏族谱序》相比,二者真有着天壤之别。

其实,胡文在论说杨万里深刻的理学思想时,其所犯的毛病与《罗塘许氏族谱序》落款的舛误倒颇相似。这篇序文明说写在乾道六年(1170),这一条是“后人”不能更改的,因为该谱即重修于这一年。然而这一年,杨万里“阅十有七年而后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语)的《诚斋易传》不仅没有写成,甚至还没有动笔呢。《诚斋易传原序》杨万里的署款为“淳熙戊申八月二日”,这一年是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与乾道六年(1170)相隔十九个年头。也就是说,最早在乾道九年杨万里才有写作此书的打算。既然如此,怎能说写作《罗塘许氏族谱序》时,他的思想与《诚斋易传》中的思想“如出一辙”呢!因为可以想见,此时杨万里的易学思想不会像十九年后的思想那样成熟,当然,1170年时已44岁的杨万里的思想也不至于像《罗塘许氏族谱序》中那样浅陋无学。因此,胡文从杨万里的“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角度逆推此文为杨万里所作,其方法也是很成问题的。

余论:家谱所载佚文不可轻信

无独有偶,几乎在胡建升先生发现《罗塘许氏族谱序》佚文的同时,《寻根》杂志2006年第1期也发表了柳哲先生的文章《柳宗元佚文〈谱牒论〉》。作者说:“笔者最近在翻阅民国年间刊行的安徽岳西《潜阳柳氏宗谱》时,惊喜地发现了柳宗元为《河东柳氏宗谱》所作的谱序《谱牒论》。”于是“根据对文理、年代、内容等方面的考证,笔者以为该文为柳宗元所写无疑。”但是《寻根》杂志2006年第2期即发表了卞孝萱先生的来信《柳宗元佚文〈谱牒论〉系伪作》。卞文指出了《谱牒论》中的两点错误,第一是文章弄错了柳氏祖宗的行辈:“柳奭是柳宗元的‘曾伯祖’,而伪《谱牒论》误为‘嫡高祖’。”这是柳宗元不应该犯的错误。第二错是:“伪《谱牒论》署‘唐贞元十九年春三月’‘赐进士授礼部员外郎裔孙宗元述谱’,这与柳宗元的生平不合。”如果按照胡建升先生的意见,大概应该理解为,这是“后人”修改而致误的了。该文一经发表,怀疑《谱牒论》的意见就很多,《寻根》杂志的“编者按”说:“文章刊出后引起学界的注意,有些学者经过考证,认为此文系伪作。我们现选登学者卞孝萱先生的来信,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对于这样有明显伪证的文章,卞孝萱先生指出的两点显得过于专业了,而

^①引自萧东海《〈诚斋集〉萧氏人物及杨万里相关佚作考略》,载刘庆云、杜方智编《映日荷花别样红——首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3年,第186页。

普通读者若从常识角度也能指出它的许多毛病。如“国学”网站上就挂有一篇署名裴伟(江苏镇江教育局)的文章《〈谱牒论〉是伪托柳宗元的文章》。文章说:“还有‘嗣我大唐太宗朝贞观十三年’,这句话明显不合唐人习惯,‘太宗朝’与‘贞观’重复,太宗是谥号(笔者按,应是庙号),贞观是年号”、“柳宗元会说柳姓人口‘何止亿万’?我们看唐史知道——安史之乱把人口的5292万人(玄宗天宝十四年)减少到1699万(肃宗乾元三年)[参见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作为朝廷命官的柳宗元不会如此豪情万丈、信口开河吧。”他的结论是:“因此这篇序言不可能是‘雄浑雅健,踔厉风发’的柳柳州的作品,其实是‘谱匠’(也叫谱师、谱先生)的‘杰作’。”

在此,笔者不妨再摘出一条伪证,从文字角度来看,《谱牒论》中的那句“随都遍籍,布散各省”的话也只能是清朝人的口吻。唐朝时,仅有朝廷的“三省”,“亿万”柳姓人口如何能容得下!

因此,对于明清以至民国时代重修的家谱来说,其间名人序文、所载诗文均不能轻信。家谱先天性的一个毛病就是借名人以自重,所以后世修谱者都期望从本姓寻出一个历史名人来做一世祖。“王莽著有一部家谱,称为《自本》”^①,他所寻出的王家一世祖竟然是黄帝,让人夫复何言!《红楼梦》第二回贾雨村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说:“自东汉贾复以来,支派繁盛,各省都有。”因为贾复以前,姓贾的再也寻不出一个象样的人物来了。看来如果贾家若修家谱,贾复必定是一世祖了。况且,不断重修家谱的行为,都是在家族内部展开的,没有公共力量的参与和监督,所以对原谱内容的修改就显得比较随意了。如此先天不足的家谱在千百年间不断地进行重修后(罗塘许氏谱已是第十三次重修),它所保留的历史信息除了某氏的行辈之外,其它都大可怀疑了。

这种轻信家谱所载之文的案例也不是最近才发生的,《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发表叶瑞汶的《对苏轼佚文〈叶氏宗谱序〉的考证》就是一个先声。这部叶氏家谱经历了十四次重修,所载之文一定已经面目全非。《四川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发表岳珍之文《苏轼佚文〈叶氏宗谱序〉质疑》,文章从苏轼与修谱者的矛盾、写作时间不能自圆其说、与苏轼的生平不合三个角度提出了质疑,非常有说服力。可是,时隔十年之后,一下子同时出现两件同类学案,倒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窃以为,如果在发现了《罗塘许氏族谱序》和《谱牒论》这样的文章后,先进行必要的论证,就不至于以讹传讹了。

作者工作单位:安徽池州学院中文系

①顾颉刚:《汉代学术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84页。